

“教化”的流转

——以《列女传》的传播为例

林存秀

摘要:《列女传》所树立的鲜明女性教化形象,在历代传播中被筛选和改编,通过音乐、画像、戏剧说唱等方式,加上旌表的利益诱惑,使儒家教义通俗易懂,渗透到各个阶层的女性日常生活当中。这种刻在心灵深处的内在烙印和精神操控,比起外在的法制制度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持久的压迫性。现代女性已经不是任人安顿和教化的“第二性”,而是有她们自主的抉择。

关键词:《列女传》;女性教化;启蒙;传播

DOI: 10.13277/j.cnki.jcwu.2016.05.016

收稿日期: 2016-08-28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3698(2016)05-0103-05

作者简介: 林存秀,女,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讲师,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妇女史。250300

近年来,儒学复兴似乎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女性教化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也重新被提起和讨论。“新儒家”代表蒋庆先生引发争议的文章《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谈及女性教化,并主张用《列女传》作为对现代女性进行教化的教材。那么,谁有资格“教化”,多少现代女性会认同这种教化,又通过什么方式教化呢?

一、启蒙与教化

什么是“教化”?似乎找不到与之对应的英文词语。它不能翻译成 Education,更不能翻译成 Enlightenment。一个词语和概念的出现,伴随背后一整套的政治理念。张汝纶教授在《从教化到启蒙——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起源》一文中指出,教化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即教育者将某种客观知识传授给受教育者,而是强调人的精神和品性的本质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义的文化都具有教化的功能。近代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最显著的一个转变,就是从政治内在性质的关注到对政治机构,如法规制度的关注上。在现代政治意义发生变化的时候,文化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成为国家机关制度层面的总称,不再与教化有任

何关系。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传统意义上的教化文化,更是变成了启蒙意义的文化。但新文化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有所不同,作者指出,前者以工具理性为图腾,而五四运动形成的政治文化以西方的思想历史为教条,要对这种“输入学理”的启蒙进行批评和反思。^{[1]73-78}

不仅要对启蒙进行反思,也要对教化进行检视。传统的“教化”,其意义也不是始终如一的。如果追根溯源,“教”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也”。^{[2]69}“化”,指的是人的内心状态得到某种变化。在西周时期,最常指的是礼乐教化。孔子继承周代六艺之教的传统,为了教学的需要,对上古以来的文献资料做了系统的整理,形成六艺体系。这是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转变,使原来被贵族独专的知识,转变为社会普及的文化。^{[3]58}《孔子世家》有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但是这种学术传统,到汉武帝时代,有了显著的转变,尤其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的六艺之统与儒家合二为一,依附政治,超越诸家之上,形成一种思想统治的权威。于是孔子的六艺之教,成为利禄之途,六艺变成唯我独尊的六

经。六经经典化之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影响所及,不仅限于学术和政治,并且扩及至社会伦理的层面。董仲舒企图以六艺为基础,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

对于女性教化,最早的教科书就是刘向编纂的《列女传》。关于《列女传》的性质,正如台湾学者刘静贞教授指出,刘向撰写《列女传》,并不是想要究明历史的真相,或者是为女性在历史上留下印记,而是通过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言义言理,它既是历史教材,又是经义之传。^{[4]249}刘向的思想体系中,既推崇三代的礼乐教化,又受到汉代流行的阴阳灾异的影响。在整理古籍的过程中,刘向看到三代时候的礼乐教化之盛行,心生向往,并希望恢复之而以匡正汉室。但教化唯有自化,才能化人。据《汉书》记载:“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5]1957}所以刘向撰写《列女传》之目的,在于讽谏成帝,教化后宫,并能由内而外。

刘向的阴阳灾异思想,反映在他编写的《洪范五行传》里。成帝时期,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成帝初年,历次出现天灾,例如,建始三年,发生日食,夜地震。刘向认为这是外戚显贵、王凤兄弟专权造成的。刘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5]1950}

刘向的阴阳灾异思想本于何处?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中按:“武帝末已有是书,不自刘向始也。汉代言阴阳灾异者,惟眭孟与胜同时;其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解光等,皆在胜后。则胜所引必非诸人所作。在胜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6]45}又《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曰:“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5]3195}刘向虽然在宣帝之时,奉诏治《谷梁春秋》,但是在其奏书、封事亦屡引《公羊传》之说。在汉代,尊信阴阳律历、始终五德的风气极为盛行。可见,刘向在阴阳灾异观念方面与董仲舒无异。今人蒋庆推崇“公羊”之说,而且认为女性由于自然属性,应该于家庭中得到安顿和价值的实现。这实际上是承继了董仲舒以来阴阳尊卑、内外隔离的观念。并且,以蒋庆为首的“新

儒家”也一直致力于推行儒学的宗教化,用“天”和超自然力来赋予其学说以权威。

在刘向所生活的时期,阴阳灾异经常与后宫人事联系起来。《汉书·外戚传》记载,孝成许皇后天资聪慧,善史书,自为妃至即位,一直得到成帝的宠爱。但其所生一子一女先后夭折,皇太后及帝诸舅担忧皇上无继嗣,时又数有灾异,刘向、谷永等皆认为应该归咎于后宫,最终废黜了许皇后。其后,以歌舞伎出身的赵飞燕,一跃成为尊崇的皇后,被认为是僭越礼制。刘向编纂《列女传》,把散见于各类典籍的女性故事编辑成册,可谓是首次为女性立传,且取材广泛。《列女传》在历代的传播过程中,渗透社会下层,遍及各地。但其虚构和塑造出的女性形象,渐渐凝结成为父权道德图景上的标本。那些人物绣在悒郁的紫色缎子的屏风上,织金云朵里,死后被画在了屏风上,但作为教化的范本却还鲜活着。

二、女性教化的方式

在文化知识为少数精英掌握,尤其是女性不能受教育的情况下,女性教化势必会采取更通俗化的方式。刘向《列女传》故事,尤其是贞顺和节义故事,通过诗歌、画像石、戏剧说唱等方式,使得上至贵族淑媛、下到不识字为民妇,都能通过《列女传》树立的榜样作用,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各种纲常、伦理规范。《列女传》故事流传之广泛,远至偏僻边疆。例如,在江苏、四川等边郡出土的竹简及画像石中,都发现有《列女传》故事。有情节的故事和鲜活的形象,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一直比枯燥的说教更有力量。

1.《列女颂》

司马迁刻意区分六经和六艺,推崇孔子的六艺教学。他在《史记·乐书》中论述礼乐关系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7]1214}强调诗歌乐舞,通过审美和情感打动人心而改变人的内在和外在精神风貌。汉武帝时期,曾定郊祀之礼,立乐府,采诗夜诵。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作《十九章之歌》。汉代的歌舞风气之盛,从汉代后宫嫔妃多出身于歌妓就可见一斑。例如,汉武帝的李夫人、卫皇后子夫,以及汉成帝时期的赵飞燕姐妹即是。

据《汉书》记载,成帝时,于水滨得古髻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于是劝喻成帝:“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15]1033} 汉代在各处建立各类学校推行教化,但这只是针对青年男子。

对于不识文字的女性来说,除了言传身教,还有就是依靠歌谣与图画。刘向所著《列女传》,亦包含颂和图。《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15]1727} 在历代不同的《列女传》版本中,“颂”或列在传的后面,或单独成篇。关于“颂”,它本是配有音乐又有舞蹈的诗。相比而言,《诗经》中的颂奥雅难明,《列女传》之颂却浅白易懂,便于记诵。例如,在《列女传·贞顺传》“齐杞梁妻”故事中的“颂”云:“杞梁战死,其妻收丧。齐庄道吊,避不敢当。哭夫于城,城为之崩。自以无亲,付淄而薨。”^{[18]146} 在短短的32个字中,一个完整的故事被叙述出来了。这种颂和汉代民间歌谣的形式极为相似。《列女传》中的“颂”是可以配乐歌唱的,不但能在宫中演奏教化后妃,还能在民间传唱。

2.《列女图》

在《续列女传·班婕妤》一篇中,记载成帝游后庭,邀婕妤同辇,婕妤推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辇,得无似之乎?”^{[18]322} 由此可见,汉代人有观画的风气。刘向《别录》载:“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屏风四堵。”屏风是日常生活的家具,把列女人物绘制在屏风上,就是要这些教化故事在生活中时时提点。关于女性观画,《后汉书》卷十记载东汉顺烈梁皇后小时候,“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又有陕西绥德鸣咽泉墓门右立柱题字曰:“览樊姬,观列女,崇礼让,遵大雅……”^{[19]126} 皆可见列女图画流传之广,以及女子观列女图画之盛。列女形象深入日常生活,在家族的仪式中,也经常出现。因为后世出土的祠堂和墓葬中的汉代画像石上,也发现了众多的列女故事。出现在祠堂中的画像石,应该是供百姓观看为多。

刘增贵先生的《画像与性别——汉画中的汉代妇女形象》一文,在查阅了大量的汉画像石、画像砖及壁画的基础上,考察了汉代的女性生活状况。他指出,在众多汉代画像石及其壁画中,出

现的列女群像,主要以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祠,及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为多。武梁祠的东汉画像石中,取材自《列女传》的故事,包括“京室节女”、“齐义继母”、“梁节姑姊”、“楚昭贞姜”、“鲁义姑姊”、“秋胡洁妇”、“梁寡高行”等。《列女传》有《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传,但武梁祠的列女故事主要是出自《贞顺》《节义》两章。和林格尔壁画中出现的列女故事更多,取材也更广泛。其中,榜题可辨的列女故事有“鲁漆室女”、“后稷母姜嫄”、“周室三母”、“秋胡子妻”、“许穆夫人”、“曹僖母”、“孙叔敖母”、“晋范氏母”、“孟轲母”、“齐田稷母”、“秦穆姬”、“楚昭越姬”等,以《母仪》《贤明》《仁智》三传中的故事最多。

这些历史人物画像,自然是为了宣扬道德伦理,以示教化。在汉代,不能读写的不只是妇女,大量的下层男性也鲜有机会掌握文化知识。所以,列女故事常常伴随着贤士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是在山东,而且在其他地方曾有出现。例如,在四川新津县出土的汉代石棺图像上,可以辨识出“梁寡高行”和“鲁秋洁妇”的故事。这些故事所宣扬的妇女节烈行为,在民间亦广泛流传。汉代乐府诗“秋胡行”等流行,也可于此相证。

3. 旌表

旌表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利益的诱惑,而且在于众人的传颂。《列女传》所载受到旌表者共有四人,表明在先秦时期就存在着旌表制度。《贤明传》记载“宋鲍女宗”的故事:“女宗”的丈夫出去做官,娶了外室,而女宗供养其婆母愈加恭敬。“女宗”是封号,还在其所居之地刻石,以表彰其功德。在这则故事中,刘向提出了妇人之“一醮不改”及“七去”之义。^{[18]67} 在《母仪传》中的“鲁之母师”,“母师”因为严格遵守家礼,“大夫美之,言于穆公,赐尊号曰母师,使朝谒夫人,夫人、诸姬皆师之”。^{[18]44} 以上两则故事尚没有节烈的行为,而在《贞顺传》中的两则故事就有所不同了。“梁寡高行”讲的是梁国的寡妇,夫死不嫁,梁国贵人都对她倾慕。梁王知道后,使相来聘。梁妇缘镜持刃,割去了自己的鼻子,以全贞信节。“王大其义,高其行,乃复其身,尊其号曰高行。”^{[18]159} “陈寡孝妇”的故事讲述了孝妇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便去行戍,且死在边疆。孝妇纺织赚取家用,供养婆婆。她的母亲怜其早寡,欲再嫁之。孝妇以自杀相

拒。其父母不敢再言嫁,遂奉养婆婆二十八年,终其奉祀。淮阳太守将其事迹上报朝廷,“汉孝文皇帝高其义,贵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赐之黄金四十斤,复之终身,号曰孝妇”。^{[81][62]}旌表节烈妇女的制度在后来的历朝各代中得到传承,并愈演愈烈。

4. 其他方式

在戏剧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列女故事常被编演为戏剧。戏剧表演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人们的精神风貌,传统戏剧中的《赵五娘》《李三娘》等剧目,皆以宣扬伦常为目的,所谓“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流传久远的孟姜女与秋胡戏妻故事,即出自《列女传》。到了唐代的讲唱艺术中,又出现了《秋胡变文》和《孟姜女变文》。一直到民国初年,还有《孟姜女宝卷》流传,并且故事也在舞台戏院上演。

最具说服力的教化方式,莫过于女性自己的现身说法。“三从四德”等观念在刘向《列女传》中被提出,例如,上文提到的“鲁之母师”,她有九位儿媳,她召集儿媳们教导说:“妇人有三从之义,而无专制之行,少系于父母,长系于夫,老系于子。”^{[81][43]}班昭的《女诫》,从“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等七个方面,进一步把刘向《列女传》中初露端倪的“三从四德”理论化。她也不再称赞女性的才识,把女性的价值实现完全限定在家庭之内了。东汉章帝时期,班固依据白虎观会议的内容纂述而成《白虎通》,成为君主认可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表述。班昭作为班固的衣钵继承者,《女诫》的编写自然也是这项儒家工程的一部分。

那些儒家思想体系“安顿”不了的女性,则被屏蔽于历史的视野之外,被妖魔化与边缘化,难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列女传》中实际上无意中透露了女性可能从事的多种经济活动,例如,纺织和采桑。在《母仪传》中“鲁季敬姜”故事中,敬姜教其子公甫文伯以治国之道,就是以纺车的协作为比喻的。在《辩通传》中,那位伶牙俐齿、善于辩驳的齐女徐吾,也是为了借邻居的灯火夜绩;《节义传》中的“鲁秋洁妇”,正是在桑林采桑的时候遭到了五年未归的丈夫之调戏;《辩通传》中的齐国“宿瘤女”,亦在桑林工作,而对国王的浩荡仪仗队视而不见,才被赏识而策立为王后;《贤明传》里的楚国接舆妻,及老莱子妻都是和丈夫一起隐居躬耕。

和后代正史中的“烈女传”相比,刘向的《列女传》算是唯一为“孽嬖”女性立传的。细察《孽嬖传》中的15位女性,多是姜姓的齐国女性。史载直到汉代,山东故齐地仍有“巫儿”制度。《汉书·地理志下》载:“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51][66]}未婚长女在家祭中扮演领导的角色,而这种风气何时消失倒是值得深究。

三、结语

无论是“教化”还是“启蒙”,都是男性文化占据权威和主导地位,把女性作为被改造的对象。在近些年女性研究中,出现了质疑“启蒙”的声音,认为女权运动被民族解放和启蒙运动所主宰,真正的女权运动几乎没有出现。但是,这样的评价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看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到底做了什么,她们是不是甘愿只是做被改造的对象?

如今“大陆新儒家”的兴起,正是在这样一个普遍反思“启蒙”话语的语境中。其实,这种反思早就开始了。在20世纪初,最流行的一个词语是“文明”。文明与野蛮对立,包含着东西方文明等级的意味。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文明这个词语渐渐受到唾弃,已经表明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吊诡的是,文明这个词语在20世纪末期重新变得流行起来。或许,教化和启蒙的对立,实质上显示了东西方不同的文明及文化体系的对立。无论是启蒙对抗教化,还是以教化来对抗启蒙,都显示着一种充斥着等级观念和认知。如果依然采取二元对立的方式,其实还是以反对的姿态维护着所反对的东西。在涉及女性观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传统的教化而言,我们以《列女传》传播为案例的剖析中,看到教化怎样由礼乐和谐的美育变成道德绑架的杀人礼教。实行礼乐教化,应该恢复先秦礼乐教化和孔子的六艺美育,致力于传统儒家人文精神的复兴。中国古代思想中把世界称之为“天下”。冯友兰先生认为,从孔子时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政治思想家,就开始考虑世界范围内的政治问题。今天的儒学复兴,也应该保持自信的心态,而不是狭隘、等级、对立。

当前出现的一些所谓“女性教化”言论,主张在家庭中安顿女性。其实,是一厢情愿地把家庭想象成为内部和谐的组织,忽视了在父权体系

下,女性在家庭中仍然处于弱势的处境。台湾学者郑雅如在《中古时期的母子关系——性别与汉唐之间的家庭史研究》一文中,运用史传、墓志、文集、笔记小说等资料,考察了中古时期的母子关系,从丧服礼制对母子名分的界定、母职与子道的建构、嫡庶之争等,分析了家庭中的权力结构和关系,以及这些又是如何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4]135-186}在儒家体系中,贤母教子的故事最受士人推崇,强调儿子功成名就以达到“母以子贵”。但儒家的母子关系贬斥母子私情,强调父子一体。相比而言,佛教故事也存在教化的意义,却呈现出比较亲密的母子关系。例如,《目连救母宝卷》,在民间戏剧演出和讲唱艺术中经常出现。佛教一方面细致描绘母亲的生养辛苦,加重人子对于母恩难以回报的负欠感;另一方面,又认为母亲多邪见贪嗔,易堕入地狱,需要儿子借助佛力,救母脱离苦境。

从隐喻的意义上来说,佛教中对母亲的描述,更接近人情和事实。而在《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中,蒋庆先生慨叹儒教的亲和力不如佛教,认为原因在于儒学没有宗教化,要通过加强祭祀、祖先崇拜等仪式,推动佛教在民间的信仰。在阶级社会中,宗教麻醉了人们的精神,把各种痛苦归结于前世,把福祉寄托于来生,而不从社会政治的层面去找原因。任何一种宗教和精神信仰,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脉络中产生的。“新儒家”的种种设想,都是建立在空想之上的,这种倒退主张也会遭受唾弃。

在中国当前质疑启蒙、儒学回归的语境下,女性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关系,势必会被重新考量。应该有更多的女性研究者介入这个话题,并对当前某些不利于两性平等的观点和言论有所回应。究竟谁来安顿?怎样安顿女性?这需要女性自己才能决定。

【参考文献】

- [1] 张汝伦. 从教化到启蒙——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起源[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
- [2]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63.
- [3] 逯耀东. 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4] 李贞德. 中国史新论——性别史分册[C]. 台北: “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社, 2009.
- [5]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6] 钱穆.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7]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8] 张涛. 列女传译注[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 张艳玲

The Transformation of “Jiaohua”

——A Study of the Spread of *LieNu Zhuan*

LIN Cunxiu

Abstract: In the Han Dynasty, the “Jiaohua” on women did not follow a rigid law system, rather involving flexible rituals and music. The book *LieNu Zhuan* portrays many vivid female images propagated by ways of music, pictures, dramas, and sayings. It also includes information on the commendation system, which helped Confucianism infiltrate women’s daily life among every class. Compared to external laws and institutions, this inert control caused greater invisibility and longer periods of oppression.

Key words: *LieNu Zhuan*; “Jianhua”; media; propagation